



NEW
ENLIGHTENMENT
SERIES 1

听启蒙

时代与选择

新 启 蒙 (1)

时代与选择

主编：王元化

责任编辑：龙育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3 字数：6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355—0713—1/G·748

定 价：1.20元

目 录

- 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 童大林 (1)
- 为五四精神一辩..... 王元化 (9)
- 时代与选择..... 阮 铭 (32)
- 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 刘晓波 (62)
-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论..... 许纪霖 (77)
- 编 后

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

童大林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是中国头等大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动、大转折中。改革、开放将决定着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

中国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异常艰难的革命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现在，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通过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国将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争取世界未来的光明前景，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是胜利的十年。中国经济在十年中取得的巨大进展，举世瞩目，中国人民自己也引为自豪。众所周知，在十年前，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今天，中国经济正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哪位外国友人如果在十年前到过中国，今天又来了，那么，中国的昔日旧印象和今天的新面貌，对比之下是会一目了然的。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含义，既是进步发展、富裕和繁荣，而矛盾、困难、失误，甚至走弯路，也是它的同义语。尽管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消极、阴暗，以及所谓“危机”的现象；但同时，种种积极、光明和克服“危机”的力量，也处处出现，并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主流。

有人问过，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回答是，其中一条主要经验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换一句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从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到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大经济）的转变，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非常困难艰巨的。中国的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根深蒂固，不容易松动。而那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产品计划经济，至今仍难于摆脱。而这都是由于许多旧思想、旧观点、旧习惯势力、旧框框、旧行为准则，等等，还千丝万缕地纠缠在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如果我们的改革者、决策人和广大的企业家们，不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地去探索，敢于冒风险去实践，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就会陷于困境，或是进进退退，甚至一筹莫展。因此，还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即1978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是延续了十年，而且还要延续下去。我们称之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观点，或是哪一种政策、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真理？不是看谁说的，不是看哪一本书上写的，也不是看其是否“权威”或经典，而是看它们在实践中成败得失，看它们的效果，即看它们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富裕。

在这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萌发的时候，中国理论学术界就活跃起来了。一大批大胆探索、敢于创新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未来学家），都在努力把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在这十年中，他们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概念、新理论，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学术研究作出了出色贡献，无愧于国际理论学术界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在这里，我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关的经济理论方面的一些新认识，简单地介绍一下，就教于国内外的朋友们。

关于市场经济问题（中国习惯用语是“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有些人甚至把商品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似乎社会主义经济运用了市场机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也有些人把中国运用商品经济，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叫做“补资本主义之课”，等等观点我们认为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商品经济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来回答了。

我们认为，商品经济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经济制度。

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一种运行方式——一种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方式。

简言之，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方式。

依我看来，商品经济这种经济方式，其发展过程大体如下：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开始产品交换起，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货币的出现，就开始了古代商品经济；

——银行的兴起，进入了近代商品经济；

——金融资本促进了现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高级科学技术将使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千万年来，商品经济这种经济方式按照它自身的运行规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所运用。商品经济和不同社会制度相结合，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历史经验证明，哪种社会制度善于运用商品经济这种经济方式，社会生产力就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

将是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所以现在 we 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新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一大突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大发展，也是我们思想解放运动一大成果。

关于所有制问题。

有人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上正在出现一种所谓“混合经济”，即资本主义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社会主义则利用市场调节。诸如此类的观点颇为流行。

从50年代初期至今，我们一直奉行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的定义，即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同时，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又具体地划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而所谓“个体所有制”则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是被消灭的对象。在实际工作中，竟认为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大集体优于小集体，这都是产生“铁饭碗”、“大锅饭”的一个根源。

斯大林对所有制形式的这种划分，中国经济学界早有人对之作评论，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符合马克思的正确观点。

现在，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应有新的设想。这种设想应根据中国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一些正确观点，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依我看来，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社会占有制。

例如土地，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个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以至任何社会，都不能成为土地的所有者、私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利用者，并且这些占有者、利用者们，必须好象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好传给后代。总之，不能让地球上的土地和重大自然资源 and 自然环境，被私有者所破坏。

从我们改革的实践来看，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也只是把土地转让给农民使用，或让农民承租，并有一定年限，而土地本身不能成为农民私有。

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的住宅商品化，建立房地产市场，等等，土地本身仍由社会占有，不能买卖，而只是使用权和经营管理权的转让或租赁。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仍然要直接管理一些关系国家命脉的巨大型的基础设施，重大的公共福利事业、国防企业，和某些尖端的科技企业。这一类经济机构和组织，因其财产所有权属于政府，故称为“国家所有制”。

这里必须说明清楚，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不能太多，不能什么都要管，什么都集中到它的手里。我们曾经执行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产品计划经济，就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

——社会主义联合所有制。

从一个一个社会主义企业来说，它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联合劳动的形式。这种联合形式，主要是劳动力的联合。在劳动力联合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技术的联合，经营销售方面的联合，以至资金的联合。目前正在出现的由劳动者集资入股的股份企业，是劳动联合体中带有资金联合的一种形式。目前正在大量出现的各种横向经济联合体，如企业集团以及跨国公司，将成为社会主义联合所有制的重要形式。

——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原是马克思论及社会主义社会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但一直未被认真研究过。现在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巨大的成果——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及目前遍及城镇的个体劳动者的各种经营活动，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经济潜力。

此外，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为着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还必须允许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成份的私营经济以及“三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它们非有不可，并且要用法律加以保护，不得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

总之，上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必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把二者结合得好，社会生产力就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充分显现出来。

关于利益分配问题。

这里只讲一个关于区分“平等”和“平均”这两个概念的问题。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一条原则是等价交换。所谓“按劳分配”的实际含义也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只有等价交换才算实现了平等。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报酬“倒挂”现象（即脑力劳动的报酬低于体力劳动的报酬）等等平均主义，正和平等原则是两回事，是水火不相容的。平均主义是违反等价交换和按劳取酬原则的。现在我们正在强调“公平分配”，这个所谓公平应是平等而不是平均。平均主义是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东西。平等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从70年代起，国际经济学界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战略，并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中国经济学界很快就接受“经济发展战略”这个观点，并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研究。不但在经济学界，而且各个地区、各个产业、行业以及企业都在研究它们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到2000年，中国要达到小康水平（其主要标志是人均国民收入达800—1000美元）；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中国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时，依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重点：

——把逐步解决十亿以上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用，等等）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合理地利用我国国土上各种自然资源，有计划地安排全国生产力的布局。发展我国优势资源产业，进行国家的重点建设（主要是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特别是把持久的全体人民都要参加的植树造林运动作为一项国策。

——开发智力宝库，形成知识劳动者的宏大队伍，争取在先进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向世界先进行列。

近十年来，我们在同世界各国科学界、学术界、教育界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交流、研究的活动，日益频繁。对国际上各种新兴的学科及其成果，我们抱着非常强烈的兴趣。我们曾召开过无数次各种研讨会，倾听国外朋友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的各种有益的建议。这些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活动，我们将继续做下去，其规模和深度将越来越广泛、深入。因为这对开阔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想，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获得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们看到，在人类史上，每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总是先行，并成为社会飞跃的灵魂。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就是明证。如上所述，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既是历史上一场进步思想运动的继承和延续，更是创造未来世界的先声。至于它当前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象一支熊熊的火把，照耀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重大决策，每一步具有决定性的措施，都是同思

想解放以及理论学术观点的突破分不开的。

我们相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中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无论是发展中的国家，还是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将猛烈地冲击一切旧观点、旧框框、旧的习惯势力，甚至对历史上曾做出贡献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都会受到重新的评价。

总起来说，中国与世界，在大改革中，在大变动中，在大转折中，在今后人类历史进程中，在未来的世代，任何民族和国家，要获得生存与发展，首先都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得到，这一场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可同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相媲美，而且一定大大超越，具有更加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

（1988年9月5日在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上的发言）

为五四精神一辩

王元化

问：明年是五四70周年，北京和上海理论界都开过讨论会。听说你在几次会上都作过发言。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五四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1919年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另一个方面则是指在1916年开始发生的思想运动。一般把前者称为五四救亡运动，把后者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都具有要求民主要求科学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过去我们对此并没有严加区分，而是总起来把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作为五四精神的代表。可是，后来逐渐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分开来。有人认为“不宜视为一个运动的同体两面”（吕实强）。也有人认为“处五·四浪漫革命之时代，学术很难不受外界之干扰，学者亦鲜有不走向十字街头的”（汪荣祖）。胡适于1962年逝世前所作的《口述自传》中，用整整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对这种看法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他说：他那时出于一番患忱，想把五四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可是终于被五四的政治救亡所阻挠而中断了。他认为当时青年由于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因此使他一直作“超政治构思”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也就被大大削减了。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胡适。他确实是从他的信念出发。我们不能把他认为青年投身救亡运动是受到政党争取拉拢这番议论和当时日本持对华侵略态度的政府、军部或

舆论说五四排日运动是受英美两国的煽动和野心政客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唆使的结果等同看待。〔一〕无疑地，胡适认为参加五四救亡运动的青年都是盲目无知受人利用，这是极大的偏见。但这种偏见是和自身不仅不反对政治而且还积极参政的胡适对于群众运动的极端厌恶以及他总想保持和平冲淡的保守宁静心态是一致的。科学地研究胡适思想以纠正50年代初那场从某种政治目的出发而毫无任何学术价值的胡适批判运动，将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不对胡适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就无法认识我国的现代思想文化史。不过我不能在这里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想要说的是，最近国内也出现一种类似说法，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是由于救亡运动。于是有人据此提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在书斋中透彻分析研究），以为这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诚然，过去在极左思潮下，政治干扰学术，强迫学术为政治（甚至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服务，把学术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确实扼杀了学术的生机。这种情况不应重复。至今它的根株未尽，仍旧在不断冒出头来。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反对学者与艺术家的参与意识，以为有了参与意识就会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有人以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不象五四那样受到救亡的冲击，所以才贯彻到底。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启蒙文化本身正是从救亡图存的要求中诞生的。五四前夕，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接着巴黎和会、张勋复辟。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严重政治事件激发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国家危急之秋，为了救亡图存，感到必须唤醒民众，“扫除蒙昧，启发民智。”后面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启蒙一词的由来。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西方固然没有发生过五四那种救亡运动，但是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思想革命和宗教革命、政治革命是紧密相关的。为什么这一情况没有造成西方启蒙运动的中断？早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在学术上作出卓越贡献多才多艺的思想家，都

关怀当时的实际生活，用笔和剑去进行斗争。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相反，成为激发他们创造力的一种活力，使他们突破了因袭成见和阶级局限。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和中世纪那些繁琐经院哲学家在四壁萧条的斗室中进行苦思冥想的治学方式截然异趣，他们也象文艺复兴思想家那样关怀生活、参与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力量。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什么两样。在抗战爆发前夕，也正是面临国家存亡关头，一些进步理论工作者又提出新启蒙口号。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些人还写过专著，何干之就出过一本《中国启蒙运动史》。我自己在1938年还发表过《抗战文学的新启蒙意义》一文（见上海书店重印的《抗战文学论文集》）。可是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启蒙的提法，这次出现不久的新启蒙运动也就夭折了。至今我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想查阅党史资料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不管怎样，在抗日战争前后，理论界曾再一次揭橥了启蒙的旗帜，这是事实。

问：既然你不赞成救亡压启蒙的说法，那么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答：在于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他们错误地把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自我意识，人性、人道主义等都斥为和马克思主义势如水火、绝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类似的想法恐怕至今并未绝迹。长期以来，我们对马恩著作中关于个人的自由发展、自我意识、人性、人道主义等等的论述，一概采取了回避态度。〔二〕直到这几年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才开始援引有关这方面论述的马恩原文。例如，《共产党宣言》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论述，《资本论》第一卷对“人的一般本性”和“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大性”以及第三卷和《神圣家族》对人性的论述。这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长期以来我们流传的以阶级的人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本性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至于马恩把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叛逆精

神，提出它的反封建意义，我们从他们著作中可以多次读到。他们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是，诸如此类的论述，竟然成了禁区，没有谁敢于在自己文章中加以援引，而这一切是发生在超稳定性的封建主义力量仍然强大，我们的反封建任务并未完成的情况下。十年前，个性解放、独立意识、人格尊严、人格力量、人性、人道主义等，都成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思想上来说，除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和在理论上不成熟外，也由于我们受到一种传统偏见的束缚。我愿再引述一段去年初拙文中说过的话：我国传统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性失去了它的主体性。但是，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正如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没有人类的自由发展一样。用群体来抹煞构成群体的个体，那只是抽象的群体，这种抽象的群体和抽象的理念没有什么两样。否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是和否定人性联在一起，也和否定个人，否定自我联在一起的。实际上，压抑个性，扼杀个性的结果，就会使健康的合理的个人意识被邪恶的个人贪婪所取代。因为个人的自我是不能被消灭的。在“文革”中斗私批修，狠抓私字一闪念闹得最凶的时候，也正是社会公德被践踏和社会道德最败坏的时候。不能想象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是无价值的，而由他们构成的群体竟会是有价值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进化。（见《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

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受到苏联庸俗社会学的机械论和日本福本主义极左思潮的很大影响。传统文化的固有偏见，再加上传人的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双管齐下。这种情况形成了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幼稚，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不会

使人感到奇怪的。我认为这就是五四启蒙运动中断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点呢？没有必要把责任推诿到救亡上去。所谓救亡压启蒙，这是事实，不能成为规律，因为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一方面将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归咎于救亡，一方面对于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采取了一种吞吞吐吐、暧昧不明的态度，一方面又不愿置身于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之外，这就形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我们不是完人，不能没有错误。理论工作者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错误，要有一视同仁的不容情的态度，而不能文过饰非，采取弥缝补漏的办法。

问：你对海外学者关于五四的评价有什么看法？

答：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五四采取了一种漠然态度，理论界也很少加以研究。海外的情况却不同，对五四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人读后深受启发。不过，我对于有些海外学者否定五四的偏激态度是不能苟同的。我认为，对于近七十年前发生的、曾对我国历史起过并还起着巨大影响的这场运动，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公正地加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时候了。在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需要的。可是，海外学者中有人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杜维明）。还有人进一步说，五四“文化大革命”的先河。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和五四反日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另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学报》上为本杰明·史华兹教授的《五四运动的回应》写的书评中也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而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和作风在“文革”时勃然再起，这对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的老遗传，而又受有时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真是一拍即合”（唐德刚）。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不如说更多地出于偏见与好恶。其实把五四精神和义和团精神以至造反精神一锅煮，是一种不分皂白的牵强

说法。为什么把五四作为“文革”的先河，而不把义和团视为红卫兵的前驱呢？后两者倒是有共同的根源，都基于同一的农业文明，或象张光直教授所说，一种连续性的、发源于萨满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传统。在天安门受检阅的红卫兵，那种完全丧失理智的狂迷、号叫、哭泣，有如巫神附体，准备为了愚昧的崇拜赴汤蹈火，献出自己。这和义和团以同样的狂热和愚昧，凭着刀枪不入的符咒，冒着敌人的炮火，毫无畏惧，前仆后继，有什么两样？试问呼唤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启蒙思潮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种不伦不类的类比，这种由于嫌恶而产生的偏见，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辨证。流风所披，这些年来，随着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传播，国内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评价五四的类似论调。我觉得对五四的这种嫌恶是由五四的反儒精神所激起的，从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崇儒立场出发，自然会引伸出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

问：是的。经过认同，认为五四主张全盘西化和全盘性反传统已不是某几个海外学者的观点了。在国内似乎也逐渐风行起来。听说你在最近几次理论讨论会上都对这种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你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谈谈你的意见？

答：是的，我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也许和很多同志的看法不同，但我不想掩饰自己的观点。目前我正在准备中。你是喜欢用“超前”这两个字的，现在要我还未准备好也超前，我有些为难。但既然开了头，那就谈下去吧。

从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以对儒家的态度来衡量国内学者，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谁就是开明改革派。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所以作了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